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须有合理的学科定位与边界划分

刘明远 李 彬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停留在对现实经济政策解读论证的层面,把这个层面的实践经验总结概括为基本原理所做的努力严重不足,以致造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体系的构建逐渐被现实经济政策的解读论证所取代。造成上述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体系中的有些学科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与边界划分,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解读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策略之间一直处于混淆的状态。因此,在必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今天,明晰两者的定位与学科界限显得尤为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混沌局面,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工作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研究;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9)06-030-08

一、问题的提出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把《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的理论视作自己的基本原理,而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部分基本上局限于对现实经济政策的解读论证。基本原理不足的困境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教学等诸多环节均有突出的表现。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由于理论性、逻辑性均很强,老师讲得顺手,学生也爱听。但是,一讲到社会主义部分,老师与学生均强烈感受到这不是讲原理,而是解读和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策略,师生均感到难以适应这种反差。按照现实经济政策讲授,有悖于政治经济学原理课;按照政治经济学原理讲授,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讲授的原理,更没有《资本论》那样的逻辑结构。也可能是受这种困境的影响,为了名正言顺地解读论证现实经济政策,有些高校开设了一门名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课程,后来又更名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由于这门课程侧重于研究现实经济政策,所以它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一方面解读、分析、论证现实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根据环境的变化,探索更加有效地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政策,其内容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处于不断更新之中。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内容上的重复也突出地表现了出来,老师与学生都分不清楚这两门课之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里。不仅如此,解读论证这两门学科所运用的范畴、规律、原理等越来越不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来自于西方经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体系的欠缺日益突出地表现

收稿日期:2018-04-16

作者简介:刘明远(1961-),男,内蒙古鄂尔多斯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李彬(1992-),女,甘肃民勤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货币政策及其理论基础研究。

出来。

本文认为,政治经济学陷入上述困境的原因很多,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体系缺乏明确的学科分工与边界划分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应当由“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解读论证现实经济政策”^①三部分组成。所谓“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经典理论。所谓“基本原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所谓“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就是“解读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政策策略及其成果”。如果将这三部分内容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看待,这三个学科拥有不同的地位和职能,它们在各自的层面上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指导思想”是行动指南,“基本原理”是制定与实施现实经济政策与策略的理论依据,“现实经济政策研究”是专门解读、分析、论证党和政府现行经济政策策略的行为及其成果,而“现行经济政策策略”又是专指党和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达到某种目标,完成某种任务而制定的行动原则、工作方式、行动步骤和具体措施的统称。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仅拥有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还拥有以问题为导向、日益完善的现实经济政策研究,但是尚未将丰富多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纷繁复杂的经济关系提炼、加工为政治经济学原理体系,因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体系中存在一个亟待完善的环节。本文就此状况进行探讨,目的是为了说明学术界不能把“现实经济政策研究”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在重视现实经济政策研究的同时,还应当下大力气为制定、解读、论证现实经济政策创建理论基础,还应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学理化、系统化、规范化提上议事日程,努力创建一个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经济学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类学科的特殊地位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指导思想”建设。1921年,中共“一大”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1945年,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此后,党的代表大会又陆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还将其写入宪法,确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在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创立者群体中,他们都有较多的思想、理论、学说、观点,这些成果几乎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多个领域,由于他们的领袖地位,以及思想、理论、学说、观点的权威性,因而被党和国家赋予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地位。为了使这些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深入人心,巩固其地位,党和国家将其创立者的著述以“全集”“选集”“文集”“文选”等形式予以有组织、高规格、系统性地出版。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集》《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这些著述思想丰富、自成体系。通过出版这些著述满足民众了解、领会、研究领袖人物之思想、理论、学说、观点的需要。

由于领袖人物的著述一般体量都较大,其思想、理论往往分散在众多的著述中,这种状态既不利于普通民众对指导思想的理解与把握,也不便于其传播与普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推动指导思想的宣传、普及,方便民众的理解与把握,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1)把指导思想类课程设定为国民教

育系列的政治理论课,强化其进课堂、进头脑,使其真正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广泛熟知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2)组织专家学者把“指导思想”创立者著述中的基本理论、基本思想进行系统总结概括,使之成为更加理论化、系统化、条理化、大众化理论体系,使其更容易进课堂、进头脑。具体说来,把马列主义基本思想、基本理论总结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式总结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其理论体系有些由专家学者研究确定,有些则不仅要经过专家学者的精心总结概括,还要通过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予以确认公布。例如,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设计师,陆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与政策建议,中共十四大(1992年)最终将这些内容概括为9个方面,形成了一个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多项内容组成的理论体系,称其为邓小平理论,这些理论有的成为国家制定具体政策的指导思想,有的直接被确定为国家的基本政策,予以长期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样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内容的思想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概括为八个方面,即:(1)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4)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6)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7)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八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综合性科学体系。

在上述拥有“指导思想”地位的理论体系中,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构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奉献了方法论、研究对象、基本原理在内的一系列理论成果,提出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六册结构”计划,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奉献了第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资本论》,为构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列宁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提出了“帝国主义基本特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新经济政策”等理论要素。斯大林在创造了“苏联模式”,领导苏联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建成工业强国的同时,还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一书中总结概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遵循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大关系”等理论。邓小平针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分配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等。胡锦涛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习近平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新时代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提出了“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等重要经济思想。^[1]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新成果在内的经济理论、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为构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指导思想。

总的看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不仅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体系,还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先进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综合性、根本性、原则性、导向性、前瞻性、权威性、统一性等特征和功能,因而被赋予行动指南与各项建设之理论基础的地位。把这样的学科体系置于各项社会科学的顶端不仅有利于确保“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有利于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制定和执行现实经济政策需要这样的指导思想,构筑政治经济学原理体系也需要这样的指导思想。但是,对“指导思想”的解读论证不能取代“基本原理”的构建,也不能取代对现实经济政策策略的解读论证。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理”“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各学科之间的关系

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类课程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理论来源、体系构建、解读论证、传播方式、基本作用的特殊性,其它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体系的构建、经济政策与策略的制定及解读与论证,均按照“指导思想”确定的立场、方法、目标、原则、行动方式等行事,不能背离指导思想,更不能与指导思想发生冲突。事实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总体框架下,这三个学科之间虽然有明确的分工、职能和界限,但在内容上是相通的。例如,“指导思想”中有关哲学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原理”与“现实经济政策研究”类学科的方法论;有些经济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基本内容,有些则是正在执行中的经济政策和策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指导思想”类学科对“基本原理”“现实经济政策研究”类学科的影响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指导思想”这种特殊地位和影响作用并不意味着对其解读论证可以代替“基本原理”的构建,也不意味着可以取代“现实经济政策研究”,而是更好地指导和促进后两个学科的发展。

本文在这里讨论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指政治经济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在大量观察经济实践、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概括而来,所以其正确性能被实践所检验与证实。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可以推演出各种具体的定理、命题、规律等,从而对进一步深化实践起指导作用。^[2]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制定、执行、评价具体经济政策策略的理论依据,它源于具体经济政策策略,但高于具体经济政策策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论》就属于典型的阐述基本原理的著作,它为我们构筑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树立了典范。^[3]按照马克思的提示,在他的经济学著作“六册结构”体系中,专门阐述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阶级依据的前三册属于基本原理部分,在此基础上所做的阐述属于基本原理的展开与具体化形式,也就是运用基本原理对现实经济关系所做的具体阐述。基本原理虽然在一定历史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它也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扬弃、丰富、升华、完善的体系。^[4]

本文在这里讨论的现实经济政策策略,就是指党和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目标、完成经济发展任务、增进经济福利而制定和实施的行动方案、行为规则与制度、具体措施,以及为解决问题所采用的对策、方法、手段、工具等的统称,而“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就是专指系统解释、分析、论证党和国家现实经济政策策略的行为及其成果。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体系:从基本国策到权宜之计,从国民经济总体政策到行业政策策略;从所有制方面的政策策略到分配政策策略;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政策策略到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政策策略;从改革开放政策策略到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政策策略;等等。总之,那些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方式、方法、具体做法,均可以被看作社会主义建设政策与策略范围

内的具体内容。由于现实经济政策策略的服务对象是解决不同层次的具体问题,而且主要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尚待解决的问题,因而它们总是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总是带有实践性、变动性、可操作性、探索性、经验性、对策性、时效性等诸多特征。尽管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总是或多或少地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制定和执行,但人们在实践经济政策策略时,得到的只能是一些经验性事实或经验性规律,这些收获只有经过理论工作者的总结概括才能上升到理性层面的认识,才能成为范畴、规律、原理体系的构成要素。

“指导思想”“基本原理”“现实经济政策研究”这三门学科的地位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决定了“基本原理”与“现实经济政策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而言,任何一项现实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总要有一定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依据自然应当是基本原理,而不应当是另外一些“现实经济政策”。建立在科学的基本原理基础上的现实经济政策策略可以有效地降低其盲目性与不确定性,减少因经济政策策略的负面效应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所以理论工作者很有必要努力创建政治经济学原理体系,为国家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策略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制定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时有一定的理论依据自然是优势,需要很好利用,但也不能说所有缺乏理论支持的现实经济政策策略都缺乏效率,在某些具有开创意义的现实经济政策策略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当事人往往从经验事实以及形成问题的时间、地点、环境等感性认识出发,运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解决问题,结果幸运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缺乏经济学原理支持的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正确与否只能由其最终结果来评价,也就是只有当结果令人满意时,才能证明之前采取的政策策略是正确的,所以这类经济政策策略总是存在较大的风险性,因为处于实践层面上的政策和策略,其实践性、探索性、经验性、对策性特征表明其最终效果究竟如何存在不确定性,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的基本途径之一是理论工作者应当加强理论创造,努力把现实经济政策策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事实总结概括为基本原理,使其能够指导新的经济政策策略的制定与实施。只有建立起这样的结构,即基本原理指导下的现实经济政策策略的制定与实施,现实经济政策策略基础上的基本原理,才是社会主义经建设所需要完整的学科结构。

缺少了基本原理,就成为缺少理论依据的仍然处于实践检验状态的现实经济政策策略,而缺少了对现实经济政策策略的解读、论证,就成为不接地气的完全抽象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一直处于有待加强与完善的状态。

四、划分“基本原理”与“现行经济政策研究”的迫切性、实现途径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指导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始终给予高度重视,不仅建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还形成了完整的发展和完善体制机制,以及较为完善的宣传、普及系统,其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很有效的体现。但是,在处理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现实经济政策研究”的关系问题上显得较为滞后,普遍的做法是把对现实经济政策策略解读论证的成果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近年来的表现更加突出,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经济政策策略的解读论证成果直接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称其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伟大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且专门服务于这一伟大实践活动。这种观点不仅有悖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而且混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现实经济政策策略解读论证类成果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造成新的不利影响。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已有六十多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已超过四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能说贫乏,至少应该是较为丰富,如果把当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的经验考虑计算在内,构建一个内容相对丰富、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体系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方面投入的精力严重不足,而在现实经济政策的解读论证方面,尤其是对现实经济运行状况评估、发展趋势预测、宏观经济管理的对策建议等方面投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致相关方面的研究人员严重过剩、研究成果铺天盖地,而研究政治经济学原理,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学者越来越稀缺,成果也越来越少,构建系统化、学理化、规范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依然任重道远。在举国上下加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今天,这个久拖未决的问题应当得到有效解决。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缺乏明确的学科划分是原因之一。当年,苏联学者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把《资本论》原理作为理论基础,根据《资本论》对未来社会的某些预见,以及现实经济政策制定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此后,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工作者编写过无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基本上没有突破苏联《教科书》体系,始终把现实经济政策的解读论证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性“共识”,即把现实经济政策策略解读论证的成果看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前的中国被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状况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 响。以政治经济学在这些年来遭遇的困境为例:当《资本论》范式不能满足对现实经济政策策略的解读论证时,人们不是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来解决问题,而是纷纷到西方经济学那里找范畴、规律、原理等所谓理论根据,使用的时候往往还不加批判,结果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排挤、被边缘化。

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想摆脱目前的困境,实现振兴的目标,下功夫构建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基本原理体系是当务之急,也是根本出路,尤其是构建一个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总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显得尤为迫切。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应当是首先划清“基本原理”与“现实经济政策研究”之间的界限,给予“基本原理”以本来应该有的定位,下大力气推动其发展。本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策略解读论证”类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之间具有明显的学科界限。简单地说,前者回答“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后者回答“为什么要这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前者提供具体做法,而后者回答为什么要这么做。前者的成果形式是政策策略类操作性知识,后者为这类知识提供理论依据。或者说,后者为前者提供理论支持,前者为后者提供实践检验。多年来,两者的界限为什么越来越模糊,直至完全被混淆,除了相关管理部门重视不够之外,政策导向存在缺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按照多年来的职称晋升、学术评价、奖励等政策规定,从事“现实经济研究”容易上手、容易发表成果、容易出名、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容易晋升职称、容易获得较高的经济回报……,而从事“基本原理”研究则是另外一番情形:长期坐冷板凳,起步与进入状态难度大,出成果难,发表成果更难,社会关注度低,影响面窄,不易出名,职称晋升难、经济回报低……。这种差异导致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现实经济政策研究”,致使“基本原理”的研究被冷落、被边缘化,从业者被迫改弦易辙,另谋有利之途。由此看来,改变现行政策中不利于调动“基本原理”从业人员积极性的有关规定,也是促进“基本原理”学科发展的因素之一。

当前,明确划分两个学科之间的界限,不仅有利于“现实经济政策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也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体系的构建。因为明确的学科划分,意味着两个学科有了各自明确的分工、研究方向和任务。两个学科领域的从业者可以专心致志地致力于本学科的研究、探索,致力于本学科内容的发展和完善。从专业优势与分工的角度说,经济学家的长处不在于制定、执行、解读、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策略,而在于把现实经济活动的实践经验提炼、加工、概括为原理,使其成为原理体系,为现

实经济政策策略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依据。制定、执行、解读、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是政府职能部门官员、政府智囊、企业管理者的优势,也是他们的任务,这就如同领兵打仗、运用什么战略战术克敌制胜是军事指挥员的任务,而为其提供军事理论的是军事家的任务一样。尤其是政府官员、企业家,他们是经济战场的亲历者,他们对现实经济环境有更符合实际的了解与感悟,什么时间、地点、环节该采取什么政策策略,应当有更大的可行性。经济学家拥有从事抽象思维、理论概括、分析论证等能力,发现理论要素、构筑理论体系是他们的长处。所以,经济学家与现实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参与者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既有利于原理体系的构建,亦有利于现实经济政策与策略的制定与执行。

五、关于“现实经济政策研究”的学科名称与内容选择问题

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属于基本原理层面的知识,按照现代流行的经济学学科层次划分标准,这门学科自然应当归入“理论经济学”。现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大量解读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策略类内容理应转移到另外一门经济学类学科中,因为这门学科属于那些运用经济学原理(理论经济学)解读论证经济现象、经济行为、经济活动,并且为解决具体经济问题提供办法、途径、对策、建议等,所以应当被划入“应用经济学”类学科范围内。把解读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策略类内容划入“应用经济学”范围内,并非降低了其地位,而是给了它符合实际的定位,提供了发挥其优势的平台,更有利于学科发展,因为应用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必须与社会经济实践紧密结合。

把所有解读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策略类内容归入应用经济学类学科,使其成为专门研究现实经济政策策略,为现实经济政策策略的制定、执行、完善提供服务,这样的学科应该赋予它一个什么名称?以往已有针对这类内容的学科及其名称,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也有针对这类内容的专题研究,如“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针对现实经济政策策略研究的重要性及参与者众多、社会需求旺盛、研究者热情高涨等社会现实,早就直接提议建立一门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策略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经济学学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研究。仔细比较各种各样的“应用经济学”名下的学科名称,包含研究对象中的关键词类名称较为直观明了,考虑到中国当前正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发展主题和发展进程,设立一门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研究”的学科专门为其服务,也是一种有价值的选择。

相对于学科名称而言,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其内容的确定。多年来,由于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经济政策策略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许许多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强有力地支持了现实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完善,也形成了许多精彩的解读、分析、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策略类成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编写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集中反映了这类成果的特征。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十分丰富,但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严重不足。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表现为:(1)政治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没有下功夫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运用抽象法总结、概括、加工为一个完整的范畴、规律、原理体系,也就是理论要素、理论体系的创造不足。(2)政治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没有很好地研究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尤其是由于自身缺乏一个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构体系,只能以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办法取代批判地利用吸收其有益成分。

在这样的状况下,明确划分“基本原理”与“现实经济政策研究”之间的边界,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两个层面上的经济学,其难点显然在“基本原理”这一头。例如,如果我们把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有关解读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策略类内容剔除出去,就基本上不剩什么“基本原理”了,也就基本上不成其为理论经济学体系了,因为原有体系主要以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主,这些描述全面、细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策略的内涵、实质、结构、内容、运作方式、目标、意义等,但极少有说明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政策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关于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丰富、具体,但有关为什么要这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却很贫乏。^[5]在这样的条件下,已经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虽然汇集了大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但要想把这些经验加工成基本原理,如果没有一大批愿意坐冷板凳的经济学家做大量艰苦的研究、抽象概括、系统化、学理化等基础性工作,如果没有杰出学者带领同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六、结 语

近几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实遇到了瓶颈:有关部门不接受按照以往套路形成的理论体系,学术界也似乎觉得一个缺乏创新理论体系难以让人接受,这种状况实际上意味着摆脱多年来以解读论证现实经济政策为主的传统理论体系,构建一个“系统化、学理化、规范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共同追求。但是,在当前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既缺少理论要素的积累,又缺少使其得以合理叙述的逻辑结构。如何摆脱当前的困境,实现理论体系构建的突破,除了吸收和借鉴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要素的研究和创建之外,很有必要明确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理”“现实经济政策研究”三个层次的学科界限,因为实施这一举措可以消除学术界把解读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等同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错误认识,使两个层次的研究者形成明确的分工,专心致志地推进各自领域的研究工作,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构建严重滞后的条件下,有利于集中力量弥补短板。应该说,一个合理的学科定位与边界划分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

注 释

①为行文方便,下文阐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简称为“基本原理”,把解读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策略行为及其成果简称为“现实经济政策研究”。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2] 刘明远.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对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意义[J]. 长春: 当代经济研究, 2018(03): 22-30+97.
- [3]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4] 刘明远. 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六册计划”的总体结构与内容探索[J]. 北京: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6(4): 131-161.
- [5] 刘明远.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与总体结构[J]. 武汉: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5): 32-40.

责任编辑: 魏 旭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ble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People-centered” Thought and Its Value of Times

Kong Xiangli, Gao Feng

Abstract: Das Kapital, a political economics masterpiece written by Marx in his whole life,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the proletariat and speaks for the broadest working class. It has had a tremendous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is known as the “Bible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people-centered” thought is the soul and esse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highlights the initial inten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for the broadest masses of the people. The two topics in two different eras share the same origin. The “people-centered” thought is a persistence,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ible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two topics jointly provide a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promote the new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truth of the topics in the two eras shines on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foundly Understand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Zhang Junshan

Abstract: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s a strategic task facing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t present and for quite some time to come. In order to implement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well, it is necessary to profoundly understand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is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should establish a modernized economic system with reasonable structure and smooth circulation on the basis of contemporary advanced technology. In the social system, the core is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consisting of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and other non-economic activities are the conditions and guarantees for the normal circulation of the economy.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should b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different activities in the social system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role in the system.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re in the face of historic changes, which require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shift from quantitative expansion to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We must ful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hanges and build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ed requirements.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easure for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provided b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asonable Subject Orientation and Boundary Division Need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u Mingyuan, Li Bin 30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ic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has been stuck at the level of interpret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real economic policies, and the efforts to summariz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t this level into basic principles are seriously inadequate, resulting in the replac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inciple system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by the interpret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real economic policies.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re is lack of clear division of labor and boundary division between some subjects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inciple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real economic policy strategy have always been at a confusing status. Therefore, when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day,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positioning and subject boundary between the two. Only in this way can this chaos be ended and the work of constructing the principle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 truly put on the agenda.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

Wang Yafei, Zhang Yi, Liao Meng

Abstract: By using the DEA-Malmquist index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of 24 provincial sampl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6 and using the estimation method of two-step system GMM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FDI on agricultural TFP growth, this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agricultural TFP of the 24 provincial sampl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6 was 3.6%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io to agricultural growth was 39.1%;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TFP was mainly promoted by agricultural technical progress, but not by the improvement of non-agricultural technical efficiency, i.e. it showed the fact characteristic of agricultural technical progress accompanied by deterior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ical efficiency; the agricultural TFP growth showed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 manifested by the facts that the growth of the eastern reg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entral region,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io of agricultural TFP to agricultural growth gradually declined in the order of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gricultural FDI ha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TFP and various sub-items, but it showed the feature of U-shaped growth in the long term; the impact of residents’ savings lagging behind for one period, urbanization process, crop planting structure and affected area on agricultural TFP and various sub-items had a certain heterogeneity.